



· 蒙藏專題研究叢書之九 ·

從蒙共六十年來演變對外蒙現況的探討

著 李毓澍

· 蒙藏委員會印 ·

# 從蒙共六十年來演變對外蒙現況的探討

## 目錄

本資料純屬個人學術  
研究性質僅供參考

(一) 前言	一
(二) 由民族統一陣線起家的蒙共	二
(三) 以圍制黨到喬巴山獨裁	八
(四) 蒙共的左傾冒進和修正主義	一五
(五) 蒙共的南北依附及一面倒	二二
(六) 結論	三二

## 從蒙共六十年來演變對外蒙現況的探討

### (一) 前言

民國十年七月，蘇俄的紅軍藉口剿滅盤據庫倫的白黨恩琴 Boron R. Von Ungern Sternberg，在少數蒙人組成的游擊部隊嚮導下攻陷庫倫。從此，蘇俄就在世界上製造了第一個赤色的衛星國家，蒙共也就在俄共的羽翼下，歷經六十餘年，一直宰制著這個傀儡政權。本文即圍從蒙共六十年演變的歷程中，試對外蒙的現況作一前瞻性的探討。

早在十九世紀末葉，蒙古地區就因生活貧困發生過一些反清統治的政治性活動，尤其是在西部外蒙古盛傳過阿睦爾撒納呼畢勒罕（轉世再生佛）的消息①，曾引起草原牧民的一陣騷動，這正是蒙古人一個古老的民族運動傳統。

一九〇五年日俄戰役結束，俄國發生內亂，外蒙地區受到從西伯利亞播散過來的社會主義思潮，稍後又從內蒙古留日學生中，混雜了朦朧的民族自決覺醒，在札薩克圖汗部南端的達爾汗旗，就掀起過由阿尤希所領導的蒙古民族自救運動②，阿尤希並提出：「削減王公台吉特權，減輕牧民稅捐負擔、王公台吉應同盡

烏拉與納稅義務，廢除旗民對王公負債的連帶賠償責任，成立旗公署，確立旗的自治制度」等<sup>③</sup>，這些號召，充分顯露出這次運動含有民主運動的意義。

民國八年初，外蒙當局醞釀有條件的撤消自治官府，本是俄國革命形成遠東權力結構的大變局，觸發了外蒙依附的徬徨，配合當時內外各項客觀因素，才締造了中國恢復在外蒙完全主權的良機。<sup>④</sup>可惜北京掌權的皖系應付不當，不祇未掌握住這個機會，反魯莽蔑裂的以武力脅迫，嚴重傷害到蒙胞的誠心向嚮，終於為赤俄製造機會，造成今日不幸的局勢。

## (二) 由民族統一陣線起家的蒙共

先是外蒙古在第一次所謂「獨立」期間，即想聯絡內外蒙及呼倫貝爾，共同組織為「大蒙古國」，當時曾一再向帝俄請求援助。俄人因南侵內蒙，將不免與日本發生猜忌和衝突，因此在民國元、二年之交，俄人肯資助外蒙西向陷科布多，侵及阿爾泰烏梁海，東向則特別謹慎，甚至扼制外蒙部份過激的主張。就連呼倫貝爾本已響應庫倫「獨立」，要求合併。俄人為中東鐵路的利益，允諾支持其變象「獨立」，仍堅拒雙方合併的要求。這對早期蒙人的民族自救運動是一個打擊。<sup>⑤</sup>

俄國革命後，紅白兩黨在西伯利亞爭逐，謝米諾夫（Semenoff）所率白黨

在西伯利亞作戰失利，頗思利用此一運動，作擴張勢力之計。謝氏本布里雅特蒙古人，幼居庫倫，熟悉蒙地情形。民國七年正美國總統威爾遜 Wilson 揭其十四點理想，為處理歐戰結束的原則，一時民族自決，極為風靡。日本乃圖利用謝米諾夫，煽動內外蒙古呼倫貝爾布里雅特合組政府，遂有大烏里會議的召開，並在海拉爾樹立政府，當時所謂「泛蒙運動」，實由日人暗中操縱指揮。

謝氏脅迫外蒙參加海拉爾的臨時政府，以八年四、五月間最急。外蒙窺有日本幕後主使，深為疑慮，謝氏迫之愈急，外蒙疑慮愈深。會當時協約國出兵西伯利亞，美軍見日本野心日熾，亦開往烏金斯克一帶，採監視態度，英法聯軍亦陸續開到。日本愈支持白黨，反有利於紅黨，易邀得美國的同情。彼此牽制，造成列強聯合出兵西伯利亞全局的失敗。外蒙自請撤消自治，同意與駐庫倫都護使陳毅磋商善後條款，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關鍵。⑥

但皖系徐樹錚脅逼撤治，蒙人不免深懷怨望，迨九年西北籌邊使署遷庫辦公，下設三處（編制應設八處），將自治官府五部悉數歸併。又威陳儀仗，以專使身份冊封活佛。強活佛先期齋戒，分向國旗，冊文，大總統玉照三度各行三鞠躬，然後恭立北面，聽專使宣讀冊文。徐氏不識活佛在蒙人心目中的神聖地位，歷史傳統上所享優禮，認為係屬禮所當然。蒙古王公喇嘛，則認為身受無比的恥辱

。封冊又選定元旦，是外蒙往例慶賀「獨立」三天的節日，更令參與典禮之人，倍增不勝今昔之痛。

於是自九年起，外蒙秘遣代表，多以私人身份活動，各方勾結俄國紅白兩黨，向日最為疑忌的日本，也成為求援的對象，九年白黨恩琴的入犯，十年蘇俄紅黨的攻陷庫倫，實皆導源於此。

恩琴為謝米諾夫舊部，兵潰正無地可容，遂借此侵入外蒙。日本軍部特派出山田大佐充任恩琴的參謀長，並派精通蒙古語文的專家四十餘人，攜帶大批款項，分赴外蒙各地，遊說各王公喇嘛。又承諾擔任軍政經費及接濟軍火，上項活動最後確曾發生了重大成效。恩琴在九年十一月間攻擊庫倫失敗，旋得到外蒙活佛及王公喇嘛的支持，十年二月間再度進攻庫倫，三月二日就將庫倫攻陷，當月二十一日活佛二度登基，建立了第二次的蒙古帝國。<sup>⑦</sup>

恩琴素有瘋人之稱，嗜殺戮，又具極大野心，在庫倫嘯聚各白黨潰散部隊，擴張其勢力，對蒙民遂不免橫徵暴斂<sup>⑧</sup>。是時日本則受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的影響，外交策略改走國際協調路線，不復支持軍部冒險北進政策，恩琴失却大援，即注定其失敗的命運。

蒙古的民族自救運動，先經徐樹錚介入撤消自治的打擊，繼而是恩琴殘暴統

治和壓榨，加以布里雅特紅黨等乘機煽動和勾結，一時如阿穆爾鮑道、丹巴多爾濟等，都先後號召蒙人奮起組成力量，從事反抗北京及恩琴統治的活動。其中有兩個小組，一個以蘇赫巴圖為首，一個以喬巴山為首，這兩個小組又經第三國際人員的指導而合併，就成為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在恰克圖組織蒙古人民黨的基本。⑨這個政黨雖不以「蒙古共產黨」為名，却是一個典型的共黨組織。

照「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的記載，蘇赫巴圖一八九三年二月二日生於庫倫東郊的買賣城（今為阿木古朗巴托爾），家境十分貧困，十四歲被雇充庫恰驛道上的馬伕，十八歲才學習蒙古文字。一九一二年參加蒙古軍隊，並接受俄國軍官的訓練，旋擔任騎兵連長。當徐樹錚的部隊駐紮庫倫時，激起退役後蘇赫巴圖強烈的反感，他積極參加革命工作就此開始。⑩

喬巴山則於一八九五年二月八日，生於外蒙最東之桑貝子旗（一度命名為喬巴山省以資紀念，現又改為東方省），克魯倫河畔貧苦牧民之家。童年因生活無著，曾一度送入寺廟為徒，長達兩年之久，故得能讀書識字。十六歲到庫倫充任挑伕及看守等工作。一九一二年入自治官府外務部附設俄語學堂讀書，並以成績優異送往伊爾庫次克俄國學校深造四年。此際受學校教師中赤黨份子影響很大。一九一八年返國，進入庫倫俄國領館服務，並受領館紅黨人員指導協助，成立另

## 一個革命小組。⑪

從這兩人的背景來研判，蘇赫巴圖的民族主義色彩比喬巴山為高，假若蘇赫巴圖不是在建國不久即被害而死（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卒，正三十歲）恐亦難逃被整肅的命運，他被塑造為外蒙的革命英雄，正由於他英年早逝，扮演了一個悲劇性的人物。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俄人指導下兩個小組召開第一次聯席會議，與會的共二十三位成員，其後幾乎全遭到喬巴山的整肅，這也透露出與會人員中多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色彩。合併後的活動，展開蒐購槍枝，和散發反抗徐樹錚統治的傳單等，所藉以鼓舞蒙人的，也走的民族主義路線。

這時期第三國際先後密派沙洛克維克夫 I. A. Sorokovikov 和波雷索夫 Borisov 來庫，聯絡並協助這個新的革命團體。⑫美國一九六八年結合多位專家意見而後撰寫的「蒙古地方手冊」Area Hand Book for Mongolia，也指明兩點：（一）由於白黨的入侵，大大地刺激了蒙古人民民族主義精神的成長。（二）這兩個團體於一九二〇年的出現，目的在有一個堅強統一的民族主義陣線，來對付外國的侵略者。⑬正與上述意見不謀而合。

次年六月十六日召開了有波雷索夫列席的第二次聯席會議，制定了黨的誓詞



，這是蒙共創立最早的基本文獻，誓詞開章明義的揭出：「黨的主要目的和任務，是肅清國內兇惡的敵人，鞏固國家，百折不撓的保衛蒙古民族」。<sup>(14)</sup>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一年三月一日的蒙古人民黨Mongolian Peoples Party-(MPP) 制定的黨綱，其第二條定明：「由於蒙古尚未獲得獨立自主，蒙古人民不可能和平的生存下去，不可能享受文化和教育的權利。蒙古人民黨規定自己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蒙古人民獨立的國家。黨的最近目的，是要使蒙古脫離中國軍閥，俄國白匪的統治，恢復不久以前被破壞的外蒙古自治」。從明定在黨綱中長程和近程的政治目標，都強烈的表現著蒙人的民族主義。

黨綱並鄭重聲明：「每個蒙古人，凡是承認黨的政綱，服從黨的規章，黨都接受他參加自己的隊伍」。<sup>(15)</sup>更是利用民族主義的統一陣線，壯大蒙古人民黨的勢力。

出席這次蒙古人民黨第一次黨代表大會的成員，共有二十六人，屬於布里雅特蒙古的三人，包括負責黨綱起草的詹沙倫諾Gantsarano。俄國三人，包括第三國際代表波雷索夫與軍事代表布里烏爾克Biyuhark，真正來自喀爾喀四部的只有二十人<sup>(16)</sup>。在大會討論政綱時，內部明顯的分為兩派，一派以波雷索夫為首，喬巴山與蘇赫巴圖附和之。主張與俄共加強聯繫，緊密合作。一派以詹沙倫諾為

首，鮑道、鄧桑、彭楚克多爾濟等附和之，主張蒙古獨立建國，仍奉庫倫活佛為元首，與蘇俄維持友好關係。後者佔大多數，他們的主張遂成為起草蒙古人民黨政綱的根本原則。<sup>(17)</sup>這也證明蒙古人民黨創立伊始，是走民族主義統一陣線，日後一次一次的血腥整肅，誅戮了多少效忠蒙古民族獨立的志士，才造成喬巴山的專政，蒙古人民黨也由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蛻變為蒙古人民革命黨（MPPD）。

(三)以圍制黨到喬巴山獨裁

蒙古共產黨的青年團，原名「蒙古革命青年團」或稱「蒙古青年聯盟」，正式成立於一九二一年八月，第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才補行了成立大會。<sup>(18)</sup>

蒙共青年團的基本成員，是由第三國際遣返的三十名蒙古青年，他們在恩琴統治期間，亡命俄境，經俄共收容培育，施以嚴格的馬列思想訓練。這批熱情而有衝力的年輕團員，在俄共大力支持下，也能嚴格的執行第三國際的命令。此項特質，在它成立後的第一階段（一九二一—一九三〇）造成完全與其他共產國家的青年團的顯著不同。<sup>(19)</sup>

一般共產國家的共青團是黨員的預備隊，或黨的外圍組織；完全接受黨的領導，執行黨的命令。初期的外蒙共青團，則完全是一個獨立的黨派，與蒙古人民

革命黨分庭抗禮，更由於它在俄共第三國際的支持下，承擔俄共控制外蒙人民黨的工具，反能常居於對立中的優勢地位。

前已分析蒙古人民黨初期組織，採行民族主義的統一陣線，黨的領導人和成員，除了蘇赫巴圖和喬巴山出身貧苦牧民家庭外，當時領導群中不少是舊日王公和高級喇嘛。他們由於出身背景，思想比較保守，施政改革也難免走漸進政策，與外蒙共青團主張激進政策，要立時清除一切舊勢力，立時共產化，<sup>(20)</sup>形成尖銳的對照，蘇赫巴圖死後，共青團的實際指揮大權就落入喬巴山之手。

俄共第三國際既有意利用蒙古共青團為控制外蒙黨政的工具，特別把它們武裝起來，並規定蒙古人民政府軍隊的政治部部长，必須由蒙青團的主席出任，益增長蒙青團的氣焰。<sup>(21)</sup>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四年兩度出面清除蒙共首要及其黨羽，即係蒙共青年團在第三國際指使下執行的。<sup>(22)</sup>

當一九二〇年外蒙代表鄧桑 Danzan、羅素爾 Losol、和察克杜爾札布 Chak-dorjab、三人小組前往莫斯科求援時，曾與列寧等俄共當局會晤，列寧、史太林及外交委員長齊米林 (Chicherin) 等都發表過極重視白黨盤據庫倫問題的嚴重性，承諾軍事協助的言論，<sup>(23)</sup>但表面上則不願與中國公然為敵。這又與一九二一到一九二四年間蘇俄的國際處境仍陷孤立有直接的因果關係。<sup>(24)</sup>

第一，出兵西伯利亞的協約國軍隊英美法等雖已撤退，而日本軍隊僅從外貝加爾省東撤，仍據有濱海省，黑龍江下游，堪察加的一部及庫頁島。蘇俄特成立遠東共和國以為緩衝。後經一再交涉，美國也頻施壓力，直到一九二二年十月，日本始允全部撤退。遠東共和國也就在任務達成後，十一月自行併入蘇俄。(25)

第二，一九二一年美總統哈丁 W.G. Harding 召開華盛頓會議，蘇俄透過遠東共和國要求參加見擯，蘇俄乃於一九二二年一月（較華會揭幕約遲兩個月）自行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冀圖藉第三國際所指揮的各國共產黨徒，以及被壓迫國家或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團體的聲援與合作，打開自十月革命以來在國際間的孤立。(26)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蘇俄急盼早日與中國恢復邦交，從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加拉罕 Karakhan 發表對華宣言，經過優林 Ignatins L. Yulin 巴意開斯 A.K. Paikes 越飛 Adoly A. Joffe，四年多奔走折衝，迄未能完成任務，(27) 為避免更刺激中國政府和人民，蘇俄在處理外蒙事務時，竭力講求謹慎與隱密。譬如一九二四年向蒙古政府呈遞到任國書的大使瓦西列夫 Vasiliev 當時就曾說過「蘇俄由於處於反動國家包圍之下，有時就必須退據第二道防線。」又說「目前情形，不容許我們宣布或提到外蒙古的獨立，所能說的只是自治這兩個字。」(28)

這正是蘇俄外交當時處境坦白的供述。

基於上舉客觀形勢的考慮，俄共在處理蒙古人民黨內部民族主義份子，自然願意退居幕後，指使它的代理人進行，必要時也作出少許讓步，緩和雙方的矛盾。譬如一九二四年唐努烏梁海掀起反俄抗暴，外蒙就乘機提出合併建國的要求，蘇俄一面派兵鎮壓，竟將原屬烏梁海的庫蘇古泊以西狹長地帶，面積一六〇〇〇方公里，歸還外蒙，<sup>(29)</sup>這就是今天的庫蘇古省。

如今第三國際透過喬巴山指揮的蒙共青年團，既然甘願充當對付民族主義份子的殺手，俄共正可退居幕後，樂觀其成。

在這一連串殺戮整肅中，第一個扮演悲劇角色的是薩吉喇嘛，薩吉喇嘛是西藏高僧，與活佛常有過從，當時蒙古人民政府宣布他的罪狀是高利貸的剝削者，與庫倫活佛很接近，並曾為恩琴服務。此次參加反對政府陰謀的，都是革命前那些享有特權的人，革命後奪去他們的特權，引起他們的不滿。他們並認為這一切的改變，都由於庫倫活佛喪失了他的實權所致，因此徵得後者同意，招收恩琴的餘孽，從事顛覆政府。「陰謀」破壞後，政府逮捕了所有參加者。庫倫活佛為了表示自己和此事無關，曾出面揭發這些陰謀。外蒙人民黨因為顧慮一九二一年的國內形勢，認為還沒有到與活佛決裂的時候，就接受了他攻擊薩吉喇嘛的表白。<sup>(30)</sup>

第二次被殺戮的是鮑道，外蒙政府科學委員會同蘇聯科學院專家所撰寫「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指稱這是階級鬥爭最尖銳的表現之一，鮑道是革命的最兇惡敵人之一。③①事實上鮑道是蒙古人民革命黨創始人之一，是一位熱心政治，效忠民族主義的平民喇嘛，一九二〇年蒙古革命黨在伊爾庫次克會商後，他負責回庫倫聯絡，並觀察動靜，臨時政府在恰克圖成立時，他擔任外交部長。正式政府在庫倫組織，他是國務總理。他執政的政策，極力主張一致對外，謀求外蒙的獨立，對內則採漸進的改革。這也就是他被整肅的癥結。嚴格說來，蒙古的民族主義者，實在是反抗蘇聯控制的自由鬥士。

蒙古政府宣布鮑道的罪狀，指明他歸附於革命的動機，是為了驅逐影響沙畢衙門收入的佔領者，他執政的措施，走上了進行挑撥的道路，企圖損害黨和政府威信，引致人民的不滿。一九二二年鮑道與上層喇嘛，過去恩琴份子，以及丹比贊桑等人建立了聯繫，把一切反人民的勢力集結成一個反革命組織。他依靠這個組織，並與日本及軍閥張作霖建立了聯繫，積極準備發動一次政變。八月七日「陰謀」敗露了，鮑道和若干同黨被逮捕，提交法院審問後，鮑道，察克都爾札布、彭楚克多爾濟等高級黨政領導階層十五人被判處死刑。這年底也消滅了丹比贊桑所結合的地方勢力。③②

俄共鑒於蒙古的內部思想上衝突相當尖銳，為加強鎮壓和整肅起見，於一九二二年七月建立了「國家內防處」，後來改為「內務部」，這個情治機構由喬巴山掌握，同時俄共的政治保衛局——格別烏，也在庫倫配合協助內防處的整肅工作。

③③ 一九二三年二月十九日，蘇赫巴圖暴斃，據後來宣布鄧桑的罪狀，是鄧氏用毒藥害死他的。鄧桑是蘇赫巴圖革命小組的成員，也是蒙古人民黨創始人之一。赴莫斯科求援的代表中，他是三人小組中的首席，會晤過列寧史大林等。臨時政府時期他擔任過財政部長，一九二二年出任軍政部長和副總理，被處死前是蒙古人民黨的中央委員，也是蒙古革命軍的總司令。③④

當一九二三年七月蒙古人民黨召開第二次代表大會時，據蒙共宣稱，當時以鄧桑為首的反革命勢力，曾竭力阻撓黨代表大會的召開，主要的原因，是他反對地方自治，清除王公札薩克在地方上傳統的權力。鄧桑等認為，這將是從基礎上改變蒙古的社會組織。七月十八日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仍照預定召集，會中通過了地方民主自治和召集全民大呼拉爾會議，在中央和地方都吸收了牧民的代表參與。人民政府就依據黨的決議，十二月五日制定了一個條例，廢除了領地王公子子孫孫世

襲占有旗的土地，牧場和牧奴的特權，規定封建主，雖可被選為旗代表，但不得本旗牧民的同意，不得管理旗務。旗札薩克要向旗代表會議負責，旗代表會議有權解除札薩克的職務，選舉新札薩克，祇需事後呈報人民政府批准。<sup>③⑤</sup>

為了推行這次全面的大變革，四部和旗的名稱都加以改變，土謝圖汗部改為博克多罕烏拉省，車臣汗部改為杭肯特烏拉省，三音諾顏汗部改為齊齊爾里克曼達爾省，札薩克圖汗部改為杭特希爾烏拉省，藉以剷除傳統的封建痕跡。

從一九二三年冬到第二年夏，外蒙地區廣泛地展開地方行政機構的選舉活動。各級牧民或代表大會的召開，選出了「十戶」、「巴嘎」、「蘇木」、「和順」和「艾馬克」各級地方行政機關。「通史」中強調，這些選舉都是在尖銳的階級鬥爭情況下進行的。<sup>③⑥</sup>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日庫倫活佛哲布尊丹巴格根逝世了，外蒙政府立即接收了他的印信，兩個星期後，蒙古人民黨中央委員會通過了實施共和政體的決議。宣布鄧桑的罪狀中有一條是他主張君主立憲。八月四日人民黨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鄧桑由於反對與蘇俄的關係，被共青團猛烈的指責，於是以反革命集團的罪名，他與同謀者被捕了，並立即處死<sup>③⑦</sup>。

鄧桑是一個帶有強烈民族自由色彩的人士，在當時外蒙經濟發展中，他也是



主張走非共產制度路線的代表，蒙共宣布他的罪狀，也特別強調他是反革命的資產階級。③⑧

蒙古政治的共產化，歷經了二十年，激烈的左派卻來自黨外的共青團，黨內仍不免於受年長且較保守的民族主義者所支配，團與黨遂展開爭取國家領導權的衝突，一九二三年共青團第二屆大會，公開宣布「它在組織上和政治事務上，完全離開黨而獨立」。但它的內部也有不和的現象，領導幹部層也遭到一次次的整肅。一九二七、二八年間，奉到第三國際的命令，參加蒙古人民革命黨，這兩年就有一千四百多團員取得了黨籍，一九二八年十月在第七次黨代表大會上，又整肅了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丹巴多爾濟 Damba Dorji 取消其權力，將他送往莫斯科，四年後就病死在那裏，涉嫌的反革命同謀者則一律處死。

在這次黨的大會中，也決定了團壓倒了黨的形勢，左翼分子在陸軍指揮官和團領袖喬巴山的指揮下，於四十八天的會議中，成功的驅逐了右翼派系。喬巴山終於奪得了黨的全部權力。③⑨

(四)蒙共的左傾冒進和修正主義

庫倫活佛的去世，蒙古政府接管印信後，並立即禁止再以傳統方式找尋呼畢勒罕，從此蒙古的神權政治消失了。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制定的新憲法，緒言中

特別敘明活佛的印信交與新政府保管，全部權力移轉給大人民呼拉爾會議及會議所選出的政府。正式宣布蒙古是一個完全的人民共和國，<sup>④①</sup>庫倫也同時更名為烏蘭巴圖<sup>④②</sup>。同時蒙古人民黨也變成了蒙古人民革命黨。

本來一九二〇年代初期，蘇俄外交政策相當集中於中國事件，莫斯科希望早與北京政府建交，也希望利用中國民族主義的澎湃煽起一場共產革命，為了避免與中國公然為敵，又不願失去對外蒙的實際控制，假手共青團清算誅除蒙古民族主義派的領導人士，輔助甘為傀儡的喬巴山登上權力的巔峰，正出於這基本的客觀背景。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蘇俄終與北京政府簽訂了協約大綱，同時又使外蒙乘活佛的死制定了憲法，建立完全的人民共和國，蘇俄的外交委員會宣稱「本國承認蒙古人民共和國為中華民國的一部份，但也認為蒙古不僅在內政上與中國無關，而且能獨立實行其外交政策」<sup>④③</sup>，仍是詭詐的兩面手法。

從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八年是外蒙國內政策走向極端偏左政策的轉捩點，外蒙古新政府在蘇俄第三國際與格別烏的指導下，開始鞏固它們仍然脆弱的地位，漸漸暗中破壞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右派份子，並攻擊統治蒙古數世紀之久的兩大組織，首先是貴族，其次是喇嘛寺院的堪布大喇嘛。

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左派份子與右派份子間決定性衝突，發生在一九二八年

第七屆黨代表大會，經過四十八天的激烈爭辯後，右派份子被逐出黨外，左派份子完全奪取黨與政府的控制權。對於決定重要政策目標，左派就利用其奪取的最高權力，左右黨的輿論，加速推行其計劃。此刻佔優勢的蘇俄軍隊，雄據在外蒙北方邊境，俄國戰勝政敵的史大林，保證給與偏急左派者堅強的支持。此外在一九二七年以後，國民黨已與中國共產黨決裂，並在南京鞏固其政權，蘇俄對於中國的態度也無需再小心謹慎了。國際和國內形勢的變化，都使蒙共左派份子易於走上冒險激進的路線。④③

先是在這四年的過渡階段，蒙共曾有些經濟上改革的措施，推行新的合作社制，漸漸樹立一種國家的指導經濟。一九二四年由俄蒙合資成立的蒙古銀行，發行並製定了蒙古的貨幣——土格利克④④，通貨的統一，減除了商業上重複兌換折算的損失。這些措施在經濟上獲致實地的進步，對社會也帶來一定程度的改變，經濟上的成就也無可諱言的激起了行險徼倖冒進左傾的心理。

一九二八年黨代表大會決議之後，外蒙當局宣布了新政策，經過大人民呼拉爾形式上通過實施。左派激進份子要求立刻將封建財產充公，全力實行五年計劃，將牧畜業集體化，排斥中國商業，這些極端的措施，事實上係奉行史大林的決策，也是當時蘇聯所信從的經濟思想，根本毫未考慮到蒙古粗放遊牧生產的社會

狀況。

蒙古當時的情況絕大部份人民都是文盲，根本沒有所謂工人無產階級，散布在廣大草原多是小型個人的放牧，貴族和寺院的產業雖占全國財富的大部份，但民衆仍普遍的服從傳統的權威。如此條件，蒙共所執行的新政策，就無法獲得廣泛的支持。政府又缺乏週全的組織和經驗，唯莫斯科之命是從，定然給蒙古人民帶來重大的災禍。<sup>(45)</sup>

中國商業被排斥，形成蘇俄貿易的壟斷，更加深莫斯科對外蒙的經濟控制，從輸出統計看，一九二三至二四年，輸往蘇俄的牲畜及其產品，約佔外蒙的總生產量七分之一，一九二八至二九年，就激升至百分之八十五。五，<sup>(46)</sup>而由蘇俄輸入的，一九二九年祇佔消費品的半數，蒙古的輸入量遠落後於輸出量，就造成普遍嚴重的商品荒，給人民生活上不便和痛苦。這個年代的蘇俄正在廢墟上建設，尚未達到口頭或想象具有援助衛星國的經濟實力。

一九二九年外蒙開始嚴厲的鎮壓反對派，在喬巴山的命令之下，六百餘家封建主的財產，牲畜與不動產，被充公分配給牧民及還俗的下級喇嘛。一九三一至三二年又強奪了八百三十七名大喇嘛和王公的私有財產，同時七百多家戶長被殺戮或監禁。反宗教運動分為三個階段進行，對於下級喇嘛，強迫其還俗，加入

軍隊，或從事生產行列。對於中級喇嘛，則送入集中營改造。對最高級宗教領袖則予以清算殺戮。<sup>(47)</sup>緊接沒收財產之後，就是推行集體化——一種牧民的共產公社制度——當年內就有全蒙古三分之一以上的畜牧者，被迫接受集體化。<sup>(48)</sup>

對蒙古牧人殘忍的集體化工作，進行的太急，引起了流血的叛變，雖然在一九三〇年蒙共第八次黨代表大會上，也檢討承認全國社會主義化，尚未有準備，可是貫徹莫斯科的命令，依然不得不加緊進行。更為了掩飾決策的錯誤，蒙共展開一系列的宣傳，喇嘛、貴族、頑固牧民以及民族主義份子，都成為指責或誣毀的對象，同時也整肅黨內各階層幹部，使成為替罪的羔羊。

對於尚處在幼稚狀況的手工業者及商業活動，蒙共也禁止私營，強迫工匠加入阿特爾 Artels——生產合作社。<sup>(49)</sup>

第八次黨代表大會在一九三〇年春召開，不僅未對冒險激進政策檢討改進，反對這項偏激行動加上相當的理論基礎，更決議要在五年計劃完成時，應使貧牧百分之七五以上，中牧百分之五十以上集體化。<sup>(50)</sup>又為了追求「商品的生產經濟」，成立了六個大規模的農作和畜牧國營牧場<sup>(51)</sup>。

據外蒙官方宣布的資料，在一九二九至三〇年間，大概成立了四百個集體牧場，納入的成員，名義上多達四萬三千人。這些集體牧場中並有一百五十二個公社

。為了管理和領導集體牧場，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特別設立了「全國集體牧場中央管理處」。⑤②

同時為防止資本主義的發生，決議用累進稅率的辦法對付私營工商業，沉重的稅捐在一兩年內使僅存的私營工商業手工生產者統統消滅，結果蒙古中央人民合作社成為全國各地唯一的購買者和販賣者。一九二九年由俄蒙合資所經營的蒙古運輸公司，也壟斷了全國各地的貨運服務業。⑤③

過激的冒進政策，立即造成蒙民的大災難，憤怒與恐怖的阿拉特消極的從事反抗，在三年中就屠宰了七百萬頭大牲畜，約當全國畜量的一半，使主要依賴畜力耕作的農產，也受到破壞。一九三一到三二年，成千成萬的人受到食物匱乏的痛苦和用具必需品的奇缺，將國家帶到了內戰的邊緣。蒙共不得不調派軍隊，出動坦克車來鎮壓日趨蔓延的變亂。⑤④

終於蒙共不得不承認這次災難的原因，實行集體化，須先運用宣導說服或再教育的方式，才可以推行，不是可以武力強制的。蒙古基本的落後條件，尤不能遽予執行。喬巴山宣稱：「我們的國家全面發展，尚未進入社會主義階段，而每一件事都鈔襲蘇俄的經驗，也是一項錯誤」。⑤⑤事實上這錯誤的責任應該由俄共史大林來負。

由於日本在一九三一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佔據了東北，第二年關東軍就推進到外蒙古邊境。日本威脅的加深，使史大林考慮到外蒙的混亂，會給日本製造干預的機會，才透過第三國際指揮外蒙共黨，立即停止這種冒險的激進措施。一九三二年七月二日小呼拉爾會議，發表了告阿拉特書，宣布不再干涉私人的經濟發展，解散集體牧場和農場，協助個人增加生產，廢除對畜牧工商業所施行的累進稅制，禁止對宗教的歧視，才暫時將燎原的戰火緩和下來。<sup>⑤⑥</sup>

從一九三二年經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一九四七年，蒙共大體施行社會經濟漸進主義新政策，這是冒險激進的修正路線。決定這新政策的仍是蒙共幕後主宰史大林，他也完全基於蘇俄的需要。蘇俄要保持外蒙古，成為對付中國，或日本擴張主義的一個緩衝國。在這期間的初期，甚至不肯開發蒙古的資源和工業，因為這樣，可能更誘發日本的侵略。何況蒙古只生產原料，正可加強蘇俄的經濟力量。但是一支以騎兵為主的蒙古軍隊，用來防衛蒙古並協助蘇聯抵禦外力入侵，則是需要的。<sup>⑤⑦</sup>於是在蘇俄的援助與訓練下，蒙共建立了一支八萬到十萬的軍隊，在不滿百萬的人口中的佔了百分之十。維持這支軍隊，消耗了蒙古國家半數以上的預算<sup>⑤⑧</sup>，此後蘇聯不得不稍施經濟援助，也是為了維持這支武力。

當日本關東軍試探蒙古與中國東北邊境實力時，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蘇

俄與外蒙簽訂一項秘密「君子協定」，翌年元月俄軍再進駐外蒙，一九三六年三月十二日更正式簽定俄蒙十年「軍事互助協定」。這個協定，不再提中國對外蒙的主權，莫斯科也不理會來自南京的兩次抗議。<sup>⑤9</sup>

一九三九年八月，蒙軍配合俄軍，在東部邊境哈勒欣河上，與日軍打了一場硬仗，重創了日本關東軍，這就是日人所稱的「諾門罕事件」。從此日本不再向蒙邊挑釁。六年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夕，外蒙反追隨蘇俄向日本宣戰，輕易收獲了戰勝的果實。

由於喬巴山一直遵行史大林的命令不渝，德蘇戰爭期間，又能搜集牲畜與原料接濟蘇聯，竭志効忠，故能長保權位而不墮。經過第十次黨代表大會，第八屆大呼拉爾會議，所制定的一九四〇年新憲法，是喬巴山在外蒙掌權的最高峰，憲法中明定「走非資本主義發展的路線，以便過渡到社會主義」<sup>⑥0</sup>也標明將繼續走漸進的修正路線。

一九三〇年代全期，蒙古人民革命黨並未因保守派領袖的整肅，而停止了內部的權力鬥爭，最初參加革命的首要份子，只有喬巴山一人仍繼續存在於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和秘書處，一九三〇到一九三四年各階層都在反右反左下整肅，有十名省級黨部領導人被誅除，蒙共的黨員人數，一九三二年為四萬二千人，到一



九三四年就只剩七千九百七十六人。從一九三一到一九四〇年期間，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減少到兩次，一次在一九三四年，一次在一九四〇年，大會的會期也縮短了。一切詳細的決策，都有賴於黨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喬巴山漸漸依照史大林統治俄國共產黨的方式，領導蒙古人民革命黨。<sup>⑥1</sup>

一九三七年八月，總理甘登 Gendun 被處決，一九三九年三月，甘登的繼任者阿穆爾 Amor 又被處死。在這些慘暴的權力鬥爭中，許多黨和政府的官員都受到清算和殺戮。喬巴山終於從幕後走到台前，接替總理的職位，或多或少從心所欲的掌管政權。在他執政期間，從一九四一年到一九五二年黨的代表大會僅舉行了兩次，大呼拉爾會議，全國主權所在的最高民意機關，也僅開了兩次。他受到他所願服從的俄首大力支持，他的話就是法律。數年之後蒙人譴責他搞「個人崇拜」，像鞭史大林屍一樣清算他，這是一個很確當的指控。<sup>⑥2</sup>

#### (五) 蒙共的南北依附及一面倒

喬巴山的死，帶給蒙古人民革命黨一個新局面，黨的運作恢復了常態，黨員代表大會都能按時召開，名義上也由代表大會產生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會產生黨書記處的總書記及書記，政治局的委員及後補委員。書記處和政治局，才是真正的掌握外蒙古黨政大權。集權共黨的組織和運作，實質上一切都由上而下的

操縱安排，但形式上卻都是由下而上的選舉決議，高高在上的黨政領導階層，並不對選舉出他們來的大會負責。喬巴山的猝卒，幾經奪權鬥爭，才從一個短時期的集體領導，再走上澤登巴爾的大權獨攬。

澤登巴爾一九一六年生於烏布沙泊省一個貧寒牧民之家，曾在俄國攻讀經濟，回國後一度擔任烏蘭巴圖財政專科學校教師，一九三九年受知於喬巴山，出任財政部副部長，後升任部長。一九四〇年第十屆黨代表大會中被安排為中央委員，並兼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一九四八年出任部長會議副主席，四年後（一九五二年）升任主席，即俗稱為總理。<sup>⑧</sup>

按蒙古人民革命黨的組織，乃是一個典型的共黨組織，全蒙古不容忍任何其他黨派的存在，而由它獨佔的控制並監管蒙古人民的生活。黨在全蒙古十八省和首都烏蘭巴圖，省屬各縣和各自治區，都有相等的黨組織，藉以控制當地的政府行政，立法的機構以及國家集體農場。黨的總書記澤登巴爾，也是政府部長會議的主席，在黨和政擁有最高的個人權力，但還是與政治局委員分享權力，政治局在蒙共現行制度中，仍是保留集體領導制定決策的機構，這是一個包括七名委員兩名候補委員的九人集團，這個集團中，含有一名黨的總書記，一名第二書記，兩名額外書記，書記處的共同意見每佔有重要的影響之力。政治局名義上應

對中央委員會負責，但是實際上是政治局有效的控制著中央委員會。<sup>⑥4</sup>

黨和政府雖控制在澤登巴爾等少數高階層蒙共首領手中，而理論上黨員代表大會才是黨機構中最高的權力機關。最近一次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是在一九八一年召開的，大會選出九十一名中央委員，和七十一位候補委員。然後又選出政治局七名委員和兩名候補委員，黨的總書記、書記和兩名額外書記。每次提名候選中委的名單，都經俄共事前的批准，<sup>⑥5</sup>自然蒙共的黨政活動，全遵從俄共的指揮而行。

再就這最近一次當選者分析，九十一名委員中，有二十一名是新人，汰換率百分之二十三以上，候補委員七十一名中，新人達四十五，汰換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三。這固然含有六年期間人事死亡等自然更替在內，由於被提名者必為中央黨政領導階層及省市地方重要黨工人員，又必是親俄派並擁護當時黨政決策的人，竟有如此高的汰換率，就顯示出意義的不太尋常。

照黨章規定，中央委員會是在黨代表大會閉幕後的最高權力機關，執行黨代表大會的決議，並代表它監督黨政工作的運行。每半年應開會一次。由中央委員會組織政治局處理政治方面的事務。書記處處理有關黨的事務。政治局和書記處都對中央委員會負責。

黨的書記處才是真握黨的實權機關，它有五名書記，原則上都是政治局的委員。總書記在一九八四年八月前是澤登巴爾，第二書記自一九六三年曾德被整肅後即不再設置。書記扎巴拉爾負責黨的農業政策，額外書記莫龍札木次負責與經互會的聯繫工作，是外蒙第三位權勢人物。額外書記杜格蘇倫，負責黨務並督導經濟發展方面的工作。

政治局是蒙共真握政治方面實權的機關，近年來政治局委員的變動，往往視對澤登巴爾忠心以及親疏的觀點而決定。一九五九年以前，政治局的成員包括九名委員與五名候補委員。澤登巴爾為鞏固其對政治局的控制，將政治局委員減為七人，候補委員減為二人。一九八一年選出的政治局委員，澤登巴爾外，有莫龍札木次、扎巴拉爾、札蘭亞札、魯布桑拉弗丹、拉格查及巴特孟和。候補委員為阿拉坦格勒與貢布札。政治局的內部組織及其運作情形，十分保密，但每週至少開會一次，它與中委會及各部門都保持密切聯繫，重大問題即經由這些聯繫的管道，達到政治局，然後作成決策。<sup>⑥⑥</sup>

簡敘現階段外蒙人民革命黨的組織與運作近況後，再分析影響外蒙政黨演變的另一重大因素，即中國大陸形勢的丕變。

當中國國民黨誓師北伐時際，外蒙古部份黨政領導人士，就希望乘機跳出蘇

共的完全控制，如教育部長巴圖汗，一九二八、二九年間就親自率領一批蒙古青年，前往德法留學。中央委員丹巴多爾濟且在德法兩國逗留很久，甚至與駐在該地的日本外交人員發生接觸，這自然是尋求援助的一種試探。丹巴多爾濟是最痛恨蘇俄隔絕唐努烏梁海不能與外蒙共同建國的重要份子，也是曾自動協助過內蒙古反抗北京軍閥統治的人士，與他合作的還有當時外蒙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主席伽達姆巴。蘇俄最怕外蒙的民族主義澎湃，遂在一九二八年十月黨代表大會上指使親信黨徒大肆抨擊誣控，最後解除他們的領導地位，被送往莫斯科，後就客死異鄉。⑥7

又當日本挑起中日戰爭時，一九三七年七月間，外蒙又掀起一次反俄抗暴的大風潮。這個反俄的組織，潛伏在外蒙古各地區各階層，尤其包括不少留俄學生，共青團團員，陸空軍官幹部等，更出乎蘇共當局的意料。這個組織的領導人，有前已提及的總理甘登，當時擔任部長會議主席的阿穆爾，而核心人物且握實際權力的，則是當時軍政部長兼人民革命軍總司令齊密特。這次運動被蘇俄特工偵知後，克林姆林宮的當局先借商討對日軍事為由，電召齊密特赴俄，然後在途中將其毒斃。同行四人，包括齊密特的妻子，均無一倖免。此後蘇俄即指使其黨羽，發動軍隊及特工力量，將整個組織的參與者陸續逮捕處死。這事件不僅牽連到若

干中央部會首長，軍方的參謀總長，第一、二軍團長及若干師團長。地方組織中也誅連了九位省長，九名副省長，被殺害的不下四、五萬人。連過去派往德法留學回來的學生，也被羅織在內，一一誅戮。<sup>(88)</sup>

正因為這次事件牽動太廣，根植太深，蘇俄當局遂根據一九三六年三月所訂的「蘇蒙軍事互助協定」，大舉派遣軍隊進駐外蒙，才挽救了這個形將崩潰的衛星國。

喬巴山死前兩年，中共叛亂集團竊據了中國大陸，在俄共指揮棒下兩個傀儡政權，着手改進彼此的關係，也正是澤登巴爾逐漸接掌外蒙黨政大權的時期，這三十多年又須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而以中俄共反目成仇的一九六〇年代為分界線。

中俄共雖有奴主之分，但想爭取外蒙進而控制外蒙的野心，則無二致，不過由於蘇共已著失鞭，又有重兵駐紮，蒙共又是俄共一手所扶植，加以中俄共的實力相差太大，故俄共能常居於絕對優勢的地位。祇有蒙共前十年間在南北依附之中，倒頗得左右逢源之利。

依據「蒙古地方手冊」所載：從一九四七年到一九五七年，蘇聯一共貸了九億盧布給蒙古，多半係從一九五二年以後才開始的。稍後，一九五七年又貸了兩

億盧布，並送一億盧布給蒙古（分三年贈與）。一九六〇年借了六億一千五百萬盧布給蒙古，以供第三個五年計劃之用，第四個五年計劃，也有同樣的貸款，約為六億六千萬盧布。

蘇聯每年也以多少不等的其他貸款或贈款，提供給外蒙。一九六五年澤登巴爾在一次演說中就提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信用貸款、設備，都是由蘇聯提供給蒙古的」。<sup>69</sup>

其他重要的蘇俄貸款，包括一九六一年貸款一億二千二百萬盧布，用以建立工業，擴建住宅及交通設施，改進牲畜繁殖。一九六四年又貸一億四千萬盧布，用於新的建築，並從蘇俄進口工業設備、車輛、電力機械等。一九六五年簽定的另一協定，貸款四億九千五百萬盧布，延期累積達一億七千萬盧布的債務，則延長償付時間。

此外以俄援推動的特定計劃，包括那賴哈煤礦、蒙古縱貫鐵路及其他鐵路、庫倫及達爾汗的給水系統、電力站、庫倫四萬平方公尺的住宅區、機械化牲畜站、電話輸電線、各種消費品工廠以及達爾汗有十五個工廠的工業區等，種類繁多，難加估計。就以一九五七年蘇蒙合資經營的幾個聯合公司，有蒙古石油公司、蒙俄金屬公司等，俄援就值三億盧布。<sup>70</sup>蘇聯龐大的借款，已成為蒙人永無清償

之日的鎖枷，資本投資每年的孳息，勢將剝掉蒙人辛勞生產收益的一大部份。反觀中共方面，從一九四九年十月六日正式與外蒙建交，到一九五二年雙方訂立十年貿易協定，規定互惠的經濟和文化關係。這使中共與蒙古之間有一段密切合作的時期，中共的援助和勞工不斷的湧進外蒙。不過整個說來，中共援助蒙古的，從未超過蘇俄援助蒙古的四分之一。<sup>①</sup>

中共經濟援助外蒙的，計有贈與一次，貸款三次。一九六五年蒙古接受一億六千萬盧布，用以購買大陸的產品。三次貸款一九五六年是一億六千萬蒙幣土格利克、一九五八年是一億盧布、一九六〇年是兩億盧布，用來興建了一座紡織廠、一個紙廠、一個合板廠和幾個玻璃廠、以及建築道路橋樑水利等工程。中共最大的憑藉是大量的勞工輸出，正合於外蒙人力不足的需要。所謂「藍色螞蟻」，以其在住所與工作場地往來間的整齊行動，曾一度受到國際的注意。究其實際，在一九六〇年代初期，勞工最多時也不過兩、三萬人。之後由於中俄共衝突的加深，而大為減少。到前年（一九八三）外蒙驅逐最後的一批離境，如今留在外蒙的華籍勞工已所餘寥寥了。<sup>②</sup>

等到中俄共衝突，蒙共基於形勢所迫，一面倒向蘇聯，甚至充當蘇共的打手，猛烈攻擊中共。而中共對於外蒙則竭力克制容忍，專揭發蘇俄經濟上剝削外蒙



的瘡疤。譬如中共指出蘇聯是以「一架鐵馬兒（腳踏車），換走一匹真馬」。一件玩具，換一頭羊」，藉以挑動蒙人的民族主義情操。由於事證俱在，卻給俄共帶來難以應付的困擾。<sup>(73)</sup>

面對中共無情的攻擊，俄共對蒙人更充滿疑猜，惟有加強控制。目前大軍的駐紮，格別烏活動的加強，對蒙共領導階層不斷的整肅，透過「經濟互助委員會」掌握外蒙的天然資源及貿易，更進而建立「直接聯繫」，不分蒙共黨政各部會，省市地方黨政各機構，國營農場、牧場、合作社，以及各企業各工廠，統與蘇俄相關單位直接聯繫。這是肢解了蒙古人民共和國，也保持多條管道嚴密控制蒙古人。

澤登巴爾在蘇俄的鞭策下，甘供驅使，而蒙人以各種方式進行其民族主義的活動，也層出不窮。一九六〇年代澤登巴爾整肅其同僚，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奧契爾 Tomer Ochir 是一名重要的政治局委員，於一九六二年九月被整肅，很顯然的因為他稱頌八百年以前的成吉思汗，並公開鼓動民族主義的情感。一年多以後，僅次於澤登巴爾的第二號人物曾德 Lusantseregin Tsende 也遭到整肅，他是黨的第二書記，大呼拉爾的主席，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的委員，他被宣布的罪狀，是「狡猾的支持民族主義者的思想」。<sup>(74)</sup>

一九八四年八月，澤登巴爾的黨政職務又被俄共解除了，巴特孟和接替了他的地位。這已是蒙共的第三代。在作風上，令人感到的，是澤登巴爾缺乏喬巴山的草莽霸氣，更不知道第三代傀儡未來如何？

#### (六) 結論

遠在蒙古族游牧於漠北之前，生息於此一草原地區的匈奴、鮮卑、突厥，歷經漢唐，早就進入中國的歷史範圍，構成我中華民族的一部份。蒙古族興起後，宋末即活躍於中國政治舞台，十三、四世紀建立元朝，更居於全民族的領導地位，迨後復經明清兩朝五百餘年，血緣的融合，文化的浸潤，蒙古族早成為中華民族中不可分的一部份。今日外蒙古的畸性狀況，是俄國革命後，俄共利用蒙人痛恨軍閥的一時偏激心理，盡感誘騙所造成。稍後蒙人醒悟反抗，俄共則以兇狠酷辣血腥鎮壓來控制，這個由蒙共掌握的「蒙古人民共和國」，才能延續下來，此其一。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不脫強權秘密外交傳統的雅爾達密約，鑄造了世界的最大災禍，同為與德日義軸心國作戰的中華民國，竟成為被盟國出賣的被害人。所幸一九五二年在巴黎召開的第六屆聯合國大會，我代表所提出的「控蘇案」得直，翌年二月，我政府明令廢止了在雅爾達密約規定下與蘇聯所簽訂的「中蘇友

好同盟條約」。蒙古人民共和國也從此喪失了它存在的法理依據，此其二。

雖然在國際姑息逆流中，一九六一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終於進入聯合國。自從蒙共獲到這個國際機構的席次，更不免意氣風發，竭其所能從事國際活動。所有屬於聯合國體系的各種世界組織，幾乎都有它為成員之一。先後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的有七十餘國，共產國家外，有英、法、西德、日本等自由國家，印度緬甸等第三勢力。訂定經濟貿易文化協定的則多達九十餘國。這種樹立「獨立建國」的假形象，藉以掩飾其被俄共控制的傀儡實質，實為欲蓋彌彰舉世皆知的事實，此其三。

外蒙人士的反俄抗暴的民族主義思想，根植已深，歷次慘遭蒙共整肅殺害的志士，實已骨蕪血淵。就連甘供俄共驅策的喬巴山，在他執政三十年之久，尚因反對蘇聯低價收購羊毛，過分剝削蒙人利益，被克林姆林宮斥責為「狹隘的民族主義者」，慘遭毒害，卒於俄京。這一面反映出俄共統治蒙共的陰狠酷烈，一面也透露任何蒙人均難忍受壓榨。一旦時機到臨，蒙古民族主義的熊熊怒火，必將燒毀蘇聯所加於蒙人的一切枷鎖，此其四。

蒙共受馬列主義教條所困，採行非資本主義路線，並強制全蒙人民追隨。但蒙人中最大多數的牧民，由於傳統文化影響，愛好自由的習性，對此項路線完全

不予支持，僅祇冷漠的服從，或不時採取消極的抵制。城鎮都市受過較高教育的蒙人，由於反對蒙共在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控制，多與牧民走上同一行列。這種趨勢將成為蒙共推行其政策的最大阻力，甚至演變為傀儡政權的致命傷。目前由於蘇俄大軍駐紮，外蒙孤立無援，任何抗暴行動，必將召來更大的殺戮，蒙人只有隱忍不發。另一方面自一九五二年俄共的經濟科技支援，對蒙民生活的改善，全盤經濟的發展，醫療衛生的照顧，教育文化的提高，也無可諱言有一定程度的成效，這些物質上的現實問題，也和緩了牧民對俄共蒙共的敵視。(75)此其五。

總之，在不久的將來，中華民國光復了大陸，由於蒙古人民共和國這個傀儡政權實際統治這片疆土已長達六十餘年。是我們面對著的複雜問題，必須加以審慎妥善的處理。如何使祖宗遺留的疆土，金甌無缺。如何協同蒙胞向自由民主大道上邁進，解除蘇俄所加的束縛，增進蒙漢間的情誼，消除一切的隔閡，親愛精誠，同心協力，共建一個富強康樂的新中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安樂社會。正是我們這一代的重要考驗。

註 釋

- ① 茲拉特金「蒙古人民共和國發展史」陳大維譯（以下簡稱發展史）頁七七。  
前清乾隆二十年代初平準噶爾後，輝特部部長阿睦爾撒納，有繼承噶爾丹號召厄魯特蒙古統一抗清之志，喀爾喀部青滾札布響應之，釀成「撤驛之變」，歷時兩年始告教平，阿睦爾撒納走死俄境。此事影響清室邊政政策甚鉅。蒙人忽傳阿睦爾撒納再世化身佛，實含有濃厚之民族運動色彩。
- ② 中共蒙古史學會編「蒙古歷史人物集」「阿尤布傳」。
- ③ 烏拉即阿爾台軍台之一種，為牧民義務為往來官員差役供給車馬駝馱及食物等，為一勞役及經濟沉重負擔，並參閱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頁一〇二二。
- ④ 詳情參閱拙作「民八外蒙撤治問題癥結的探討」收入「中華民國建國史討論集」第二冊頁三五七起。
- ⑤ 參考拙作「民國初年的外蒙古問題」收入「蒙古研究」頁六二。
- ⑥ 同前文頁六三。

- ⑦ 同前文頁六五。
- ⑧ 參考拙作「論外蒙古的獨立問題」頁四六—四八。
- ⑨ 「發展史」頁一二六又「外蒙古」頁一〇七（譯自 G.M.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It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 ⑩ 蒙古人民共和國科學會編寫「蒙古人民共和國通史」（以下簡稱「通史」）頁二五〇。
- ⑪ 同前書頁二五一。
- ⑫ 楊汝舟「外蒙共黨之今昔」頁一九。
- ⑬ 扁舟、若如合譯「外蒙共黨之真相」（以下簡稱「真相」）頁七九。
- ⑭ 「通史」頁二五五。
- ⑮ 同前書頁二六六。
- ⑯ 「外蒙共黨之今昔」頁二六。
- ⑰ 參考張大軍「外蒙古現代史」頁一一一五。
- ⑱ 「外蒙共黨之今昔」頁二九。
- ⑲ 同前書頁三〇。
- ⑳ 張大軍書頁一一三二。

- ②1 同前書頁一一三三，又「外蒙共黨之今昔」頁三一。
- ②2 「外蒙共黨之今昔」頁三〇。
- ②3 「發展史」頁一五四、一五八。
- ②4 「發展史」頁一三〇引，又「外蒙古」頁一〇八。
- ②5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頁四七八。
- ②6 同前書頁五三四。此次會議，國父為瞭解實情，派張秋白前往參加。
- ②7 參閱王聿均「中蘇外交序幕」，全書即分析此四年多交涉歷程。
- ②8 「外蒙古」頁一一二。
- ②9 「外蒙古」頁一一五。
- ③0 「發展史」頁一五三——一五四、「通史」頁二八三。
- ③1 「通史」頁二八三。
- ③2 「通史」頁二八三——二八四。「發展史」頁一五四。
- ③3 同前頁二八四、文中隱約說明：「在建立這個機構（內防處）及其活動上，蘇維埃俄國對反革命進行鬥爭的經驗，給了很大的影響」。
- ③4 同前頁二八五——二八六，「發展史」頁一五四——一五五。
- ③5 同前頁二八六——二八七。

- ③6 同前頁二八七。
- ③7 同前頁二八九，「真相」頁二九二。
- ③8 「通史」頁二八九，「發展史」頁一五九。
- ③9 「真相」頁二九二——二九四、自一九三二年以後，共青團也成為黨的輔助機關。
- ④0 同前書頁二六四。
- ④1 同前書頁八一。
- ④2 同前書頁八二。
- ④3 郭廷以書頁五七五——五七七、「真相」頁八三——八四，蘇俄一九二一年入駐外蒙的軍隊，在四年後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撤退。
- ④4 「發展史」頁一七五，「真相」頁八三。
- ④5 「真相」頁八四——八五參考。
- ④6 同前頁八二——八三、「發展史」頁一九八則謂「到一九三一年蘇聯幾乎成了蒙古牲畜和原料的唯一購買者，蒙古所需工業品的唯一供應者」。
- ④7 同前頁八四、「發展史」頁一九八記載「一九二九年登記的封建主凡七二九戶，有六六九戶的財產被沒收，每戶只留給一〇〇胡比（每胡比相當三〇土格



利克），其餘收歸國有。一九三一年又沒收了八三七戶，內有二〇五戶是寺院封建主，有七一—戶反抗，被鎮壓後流放到指定的地區」。

④⑧ 同前頁八四—八五。

④⑨ 同前頁八五。

⑤⑩ 「發展史」頁二〇三—二〇四。

⑤⑪ 同前書頁二〇四。

⑤⑫ 「發展史」頁二〇〇引述。

⑤⑬ 「發展史」頁二〇二。

⑤⑭ 「真相」頁八五。

⑤⑮ 同前書頁八五引。

⑤⑯ 「發展史」頁二一一、張大軍書頁一三七五。

⑤⑰ 「真相」頁八六。

⑤⑱ 「真相」頁八七。

⑤⑲ 「真相」頁八六。

⑥⑰ 「通史」頁三三六，「發展史」頁二六七（一九四〇年的蒙古憲法，又稱「

喬巴山憲法」）。

- ⑥1 「真相」頁二九五。
- ⑥2 「真相」頁三七一。
- ⑥3 參考張大軍書頁三五九六。
- ⑥4 「真相」頁二九五——二九六。
- ⑥5 引自郝致誠「外蒙領導階層變動與中共的關係」(收入蒙藏現況研討會論文集)。
- ⑥6 參考蒙藏委員會史耀古「外蒙古近況」頁四〇，「真相」頁二九六。
- ⑥7 參閱張大軍書頁一三七一——一三七二。按一九二六年起，外蒙為掙脫蘇俄所加於經濟上的枷鎖，曾派往德國一個貿易團，採購醫療機械等，並邀請專家來蒙協助建設，蘇俄重施壓力下被取消。并參見G.M. Friters; Outer Mongolia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sition 所附「駐德貿易代表團及教育代表團部份人名表」。
- ⑥8 同前書頁一三七九。
- ⑥9 「真相」頁四七六。
- ⑦0 同前頁四七七。
- ⑦1 同前頁四七八。

- ⑦② 「真相」頁四五六及四七九。  
參閱張大軍書第五冊相關各節。
- ⑦④ 「真相」頁三〇〇—三〇一。
- ⑦⑤ 「真相」頁三七五。